

山河故人刘禹锡的起落悲欣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刘禹锡的《秋词》、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，都是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，恰好也是诗人23年贬谪生涯的起止点。不应忽略的是，无论仕途起落，还是诗文创作，刘禹锡的命运，均与数位重要人物，羁绊甚深，联系紧密。

如果考察青年刘禹锡的履历，很难将他和贬谪联系一处。刘禹锡21岁进士及第，同年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。《唐摭言》记录时人谚语谓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。可见进士科的含金量。“博学鸿词科”考试亦称“制科”考试，乃是优中选优的干部选拔测试，录取率极低，“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”。青年刘禹锡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。

刘禹锡先在外省历练，30岁回京城，遇到了生命中带给他最大希望也带给他最大绝望的人——王叔文。所谓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的源头，便是王叔文领导的“永贞革新”失败。

王叔文本是顺宗的“棋待诏”，唐中期的“待诏”并非清流出身，通常有一技之长，在宫中陪伴皇帝娱乐。王叔文颇有政治野心，当顺宗李诵还是太子时，便经常纵论时局，深得信赖。

政治风波改变了刘禹锡的人生走向，但真挚的友情却在余生中不断慰藉和鼓舞着他。

刘禹锡的好友包括“老战友”柳宗元、诗歌并称“刘白”的白居易、共倡古文的韩愈等一连串文化名人。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往当属君子知己的典范，二人关于“天人之际”的讨论，在中古思想史上闪耀“光芒”；而柳宗元三十卷诗文作品，有赖于刘禹锡花费大量精力编纂的《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》保留。只可惜，随着47岁的柳宗元撒手人寰，二人阴阳两隔。刘禹锡在后半生交流最密切、给予他最多鼓舞的好友当属白居易。刘禹锡23年的贬谪生涯中，二人的交往逐渐密切。

以唐宋观，判断官员起落，主要察其任职之地。大致而言，离国都愈远愈差，经济、军事地位高者好于差者。刘禹锡贬谪可分四段，分别是：元和元年(806)，任朗州(今湖南常德)司

等闲平地起波澜

顺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，包括刘禹锡、柳宗元。刘禹锡堪称王叔文的“左膀右臂”，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禹锡尤为叔文知奖，以宰相器待之。”“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，与之图议，言无不从。”因此时人号称“二王、刘、柳”。

不久，顺宗身疾，在宦官和敌对官僚运作下，被动禅位于宪宗，史称“永贞内禅”。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宪宗要任用自己的心腹；更何况王叔文出身微末，为士大夫清流所不齿。如此，依附于顺宗皇权的王叔文集团，命运天翻地覆。

刘、柳等人皆被贬为远州司马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”。更绝望的是，

元和元年(806)，朝廷诏令“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亦即无论如何，难以赦免减罪。诏令基本宣告刘禹锡等人政治生命的完结。

受限于后世视角，王叔文诸人在新、旧唐书中的角色全然负面。《新唐书》观点最鲜明，其言“叔文沾沾小人，窃天下柄，与阳虎取大弓，《春秋》书为盗无以异。”刘、柳诸君则是昏暗不明，以至于“僻涂自噬”。就连与刘、柳私交甚好的韩愈也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，认为二人“蹈道不谨，昵比小人”。

其实，王叔文的改革与施政，并未造成事实上的恶劣影响，这些负面评价更多来自士大夫阶层，对皇帝任

用“内廷”的不满。略观王叔文集团成员，便会发现绝非蝇营狗苟的“小人”，如韦执谊、吕温、韩晔等人，恰恰都如刘、柳一样清流出身，兼具抱负与能力。只能说，操之过急的掌权改革，以及对政局不够老练的控制，造成王叔文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。不过，失败的后果，却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。

刘禹锡被贬为朗州(今湖南常德)司马，到任伊始，他创作《秋词》二首以明心智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一联洋溢着积极乐观，一改“悲秋”传统，为后人称道；不应忽视的是，第二首“试上高楼清入骨，岂如春色催人狂”一联，更直观表现出其愤懑求索、孤立无援的状态。考察他的生平创作，不难发现一种蹉跎与斗志的矛盾，形成其诗沉浮得失之间的张力。《秋词》不啻是这类风格的开篇之作。

责任与追求却难让他彻底心灰意冷。

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作为千古名句广为传颂，除了新旧交替的昂扬，这一联更是刘禹锡悲情的写照——少有鸿鹄之志，此时不免颓唐，暮年不曾放弃，无奈可为有限。这种心境，恐怕只有白居易最能深刻理解。这首诗既应和着生者白居易，也追思着逝去的故人。苍颜白发也许并未让刘禹锡过度沮丧，而那些驾鹤西去的故旧，真真切切地让他感受到自己是恍若隔世的“烂柯人”。

作为终身好友，白居易在刘禹锡去世后，随即写下《哭刘尚书梦得》，其诗云：四海齐名白与刘，百年交分两绸缪。同贫同病退闲日，一死一生临老头。杯酒英雄君与操，文章微婉我知丘。贤豪虽殁精灵在，应共微之地下游。白居易一如当年的刘禹锡，在挚友的际遇和离开中，感叹着生命中那份不可弥补的缺憾。

暂凭杯酒长精神

等待命运的转机。

其后，在结束漫长贬谪、回归洛阳的途中，刘禹锡与白居易于扬州相见。这对老友在多年间互有唱和，不仅友情甚笃，且有《刘白唱和集》传世，据记载存诗138首。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是其中最著名的：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

诗中所谓“凄凉地”“弃置身”，是对自己大半生的感慨。刘禹锡始终没认命，即便于巴山楚水之间也尽职尽责，爱惜民众，还把民间俚曲加工而成优美悠扬的《竹枝词》。从心底刘禹锡也许接受了悲剧命运，但胸中的热情、

马；元和十年(816)，任连州(今广东清远)刺史；长庆元年(821)，任夔州(今重庆奉节)刺史；长庆四年(824)，任和州(今安徽和县)刺史。大和元年(827)，回东都洛阳任主客郎中。

朗州的九年岁月，刘禹锡收集民歌，与友人通信，度过寂寥岁月。其后，刘禹锡在连州四年余，因母丧离开连州，回洛阳丁忧。在连州，他依旧创作诗文，与好友互通有无。

当刘禹锡长庆四年(824)调任和州刺史时，年过半百的他已经历妻子薛氏、王叔文、柳宗元、韩愈先后离世，加之政治形势反复，已多了几分淡然。正如他后来在给白居易的诗中写道：“游人莫笑白头醉，老醉花间有几人？”刘禹锡无非是在蹉跎与落寞中，

归来还见曲江春

煽风点火，自然勾起不愉快的记忆。于是，元和十年(816)，刘禹锡再次被贬为播州(今贵州遵义)刺史。

斯时，武元衡的副手、后世贤相典范裴度以御史中丞的身份，为刘禹锡求情——刘禹锡要赡养80岁老母，携母前往荒蛮的播州对老人家而言九死一生，有违孝道。最终，宪宗将刘禹锡改贬连州(今广东清远)刺史，算是稍加体恤。裴度为刘禹锡的陈情，便是二人关系的绝好体现。不同于武元衡，裴度终其一生与刘禹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晚年更有人生知己的意味。

宝历二年(826)，刘禹锡被调回洛阳任主客郎中。此官属于闲职，实权不多，但地位待遇尚佳，后又以集贤殿学士的头衔，整理典籍，倒也符合刘禹锡的心境。其实，刘禹锡能在晚年善终，多赖宰相裴度的荐举。裴度一

生功绩卓著，分别于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三朝拜相，煊赫一时。刘禹锡晚年曾描述裴度的地位道：“万乘旌旗分一半，八方风雨会中央。”

多亏裴度的提携，刘禹锡才有机会成为“刘宾客”“刘尚书”，而在政局之中浮沉数十载的裴度，也必然理解刘禹锡的寥落与遗憾。

太和二年(828)，刘禹锡故地重游，再于玄都观题诗云：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过尽千帆，前度刘郎，晚年归来，心境究竟如何？其人又是否有所改变？

刘禹锡也许没变——还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文士，怀古诗自成一格，老友白居易说“彭城刘梦得，诗豪者也。其锋森然，少敢当者。”他始终没放弃对历史、政治、家国的思考；文宗召其交谈，遣职苏州，临行之时，姚合

“前度刘郎”可谓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典故之一，故事的发生地点——长安的玄都观，却是刘禹锡一则以喜、一则以悲的感慨之地。

元和九年(814)，身处朗州的刘禹锡奉命回京，仕途似乎峰回路转。他激动地写道“十年楚水枫林下，今夜初闻长乐钟。”关于此次回京，史家普遍认为宪宗在臣僚建议下摒弃前嫌，意欲重用旧人，加之“执政惜其才，欲洗涤痕累，渐序用之。”

然而，刘禹锡此次未能摆脱“永贞旧党”的阴影。他来到长安玄都观，回忆起自己在贞元二十一年(805)曾游览此地，时光易逝，物是人非，于是创作绝句：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本是有感而发的诗作，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指摘，向武元衡报告说刘禹锡诗涉讽刺，抱怨牢骚。偏偏此时执政的武元衡，身份敏感，当年王叔文执政，将武元衡贬官，自此元衡终其一生都与刘、柳等人不睦。此时有人

说他“三十年来天下名”；晚年到任苏州，刘禹锡积极行事，疏浚水灾，政绩卓著，文宗后赐金紫鱼袋，加以表彰。他用自己的行动，践行着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诗句。

刘禹锡也许改变了——苏州归来，致仕洛阳，他与裴度、白居易常聚会唱和，存诗颇多。他以七十岁高龄创作《子刘子自传》，文中没有表现他作为“诗豪”的一面，只是罗列晚年担任的官职作为自己的“盖棺定论”，乍看仿若一位平平无奇的官僚。也许，对刘禹锡而言，他的一生终究有未尽其能的遗憾，正如其晚年所言“以闲为自在，将寿补蹉跎。”悲怆与失意难免。

纵观刘禹锡一生，恍惚之间，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：人生的困顿也许很长，但终究长不过人世间的希望与温情，尽管其中不可避免有挣扎与落寞。人与人的际遇，交织成我们生活的世界，它引领我们走上生命的旅途，也让人不再有踽踽独行的孤单。 来源：北京晚报